

1964年大比武中的民兵身影

■杜俊楠 郭茹 陈愚

民兵是胜利之本。195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的方针后,民兵队伍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1964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培养本单位的“郭兴福”。为进行郭兴福教学法的普及和推广工作,中央军委于同年4月正式决定在全军开展民兵神枪手活动的通知和《关于组织民兵参加全军比武的决定》。全国各地民兵组织积极响应号召,结合自身特点展开比学赶帮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在各军区比武活动中民兵频频现身,留下一个个矫健身影,展现出过硬的军事技能。



吕家祖孙三代民兵切磋射击本领。



“神枪姑娘”刘延凤。

党管武装筑就民兵标杆

1964年大比武期间,民兵方阵涌现出许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先进典型,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留庄英雄民兵营和浪井尖兵民兵营。

河南省济源市留庄“英雄民兵营”,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民兵队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留庄民兵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驾起葫芦舟,摆开地雷阵,立下赫赫战功,涌现出薛平华、范瑞礼、李传玉等著名民兵英雄。他们与杜八联人民共创的“联防战”,被列为中国民兵“三大战法”之一。群众性民兵比武开始后,留庄民兵营在党支部带领下,大批批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思想,坚持先传思想后传枪,从一言一行、一招一式入手开展作风、技术“传、帮、带”;坚持劳逸结合,常备不懈,把枪带到田间地头,利用休息时间练瞄准、刺杀,青年民兵的军政素质得到极大提高,队列、射击、游泳、爆破等训练课目样样在行。1964年,范瑞礼代表留庄民兵营爆破组参加了武汉军区在信阳举行的军民比武大会,在爆破课目中荣获奖项。1964年7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武汉军区在留庄举行了命名大会,授予留庄民兵营“英雄民兵营”的荣誉称号。留庄民兵营“腰系葫芦肩荷枪”,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战斗精神赓续传承,成为全国民兵建设的一面光辉旗帜。

另一面光辉旗帜——山西省晋城市浪井“尖兵民兵营”。浪井民兵营前身是抗日支前队。经历过抗战的浪井村民以步枪为伴,以精武为荣,传承了参加军事训练、苦练杀敌本领的光荣传统。20世纪60年代初,大队党支部一班人经常跟

班训练,与民兵们一起练投弹、练射击、练刺杀。民兵们经常抓住劳动空隙,积极开展军事训练。村民牛铁保家,兄妹6人每天坚持出操训练。基于民兵李桂英每次在地下回家后趁孩子们休息时,趴在院子里练瞄准、学刺杀。她参加23次实弹射击,获得21次优秀、2次良好。这样苦学苦练的“神枪手”,在浪井民兵营还有不少。1964年大比武开展之初,面对山西省军区射击尖子队“踢馆”,浪井民兵营从容不迫,派出一名18岁的女民兵上前应战,在“卧姿精射、百米打鸡蛋、千米打气球”3个射击课目比赛中取得两胜一平的好成绩。“枪打得准,兵练得精”,让浪井民兵营在各级各类比武竞赛中屡屡夺魁。同年,山西省晋东南地委行署、军分区联合授予浪井民兵营“尖兵民兵营”称号。

这两个民兵营树立起全军民兵训练学习的榜样,促进了全国民兵队伍的建设发展。

不爱红装爱武装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毛泽东同志于1961年为女民兵题写的诗词,也是1964年大比武赛场上广大女民兵勤勉神勇和“巾帼不让须眉”的生动写照。

1964年6月9日,来自山东长岛的女民兵刘延凤随济南军区军事汇报表演队前往北京参加比武,取得了半自动步枪速射50发50中和精度射击7发7中的优异成绩。

6月15日,刘延凤和沈秀爱代表山东女民兵,在北京西山靶场进行100米距离两分钟50发速射和150米距离汽水

瓶目标精度射击两个军事训练汇报表演课目。在第一个课目中,刘延凤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侧身卧倒,出枪、压子弹,动作干净利落率先打完50发子弹。虽以47发命中的好成绩落后于沈秀爱2发,但其弹着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首战失利的刘延凤迅速调整心态,迎接第二个课目的表演。对于刘延凤来说,这次精度射击难度增加了不少,因为在平日练习时选用的目标是直径10厘米的啤酒瓶,而这次的目标是直径6厘米的汽水瓶,射击距离也由平时的100米增加到150米。射击开始后,刘延凤如有神助,5发子弹发命中,成功击碎5个瓶子。其他两位表演者发挥不理想,子弹打完后仍剩两个瓶子。此时广播里传来“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斗争、互相帮助的精神”,刘延凤重新举枪连射4发,将剩余的4个瓶子全部击碎。看台上所有人激动地站起来鼓掌,毛泽东同志更是高兴地称赞“真不愧是神枪姑娘!”

共和国领袖的赞誉传到台下,传出北京,传遍神州大地。这位1938年出生于山东长岛贫苦渔家女孩,凭借自己的坚韧不拔在大比武赛场上展现出惊人的射击“神技”,展现出女民兵“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巾帼风采。

祖孙三代皆是神枪手

这场大比武中,各地涌现出许多先进民兵典型,有民兵集体,也有几代民兵、夫妻民兵、姊妹民兵、兄弟民兵,等等。其中,来自山东烟台崆峒岛的渔民吕氏一家祖孙三代人——爷爷吕其喜61岁、父亲吕志玉33岁、孙子吕永顺14岁,格外引人注目。

1935年8月13日,红二十八军游击至立煌县(今金寨县)燕子河地区,得知国民党军第65师第195旅第390团一个营(后来得知是一个团)进驻花凉亭,企图阻截红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与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等人分析认为,驻花凉亭之敌是分敌孤立之敌,与敌军其他据点相距甚远,不易得到援助。我军当时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士气旺盛,若以长途奔袭、速战速决的打法是完全可以取胜的。根据上述分析,高敬亭立即作出“夜袭花凉亭”的决定,命令部队于当日下午急行军20余公里,在黄昏前隐蔽进至花凉亭南侧地区集结待命。方永乐作简短的临战动员后,各部队趁月夜接近敌军。

花凉亭位于立煌县方家坪通往霍山县城的大道上,是一个有着二三十户人家的小集镇,地处大别山腹地,大道两侧山峦起伏,林深草茂,道路狭窄,集镇西南侧和西北侧各有一道山岗,地形比较复杂,便于红军隐蔽接敌。敌军在花凉亭南侧高地和东北侧高地部署了一个连的兵力,并构筑了野战工事,阵地前沿有树干设置的鹿砦障碍;在黑桃湾东侧长行高地亦部署了一个连,配有重机枪火力,以保障花凉亭侧后的安全;其余兵力分布在花凉亭和田湾大瓦房地区;营指挥所位于花凉亭。

22时许,按预定作战计划,红二十八军特务营首先向花凉亭东北侧高地发动进攻;手枪团和第244团1营在方永乐的率领下向花凉亭西南侧高地发动进攻,并相继攻克花凉亭西南侧高地和田湾大瓦房;2营在进攻黑桃湾东侧长形高地时,发现高地上敌人的2个机枪火力点正在向手枪团和1营进攻方向疯狂扫射,营长立即命令6连副连长带一个班,迎着敌人猛烈的火力,迅速摸上去用手榴弹将其炸毁。战斗中,干部带头冲锋、勇猛指挥,战士顽强拼搏、不怕牺牲,充分发挥我军近战特长,奋勇杀敌。

正当各路部队进攻得手、准备向花凉亭集镇发起围攻时,红二十八军突然从俘虏口中得知,驻花凉亭的兵力实际上是一个团。鉴于敌情变化和天将拂晓的实际情况,方永乐立即下令撤出战斗。

此战,红二十八军毙伤敌200余人,俘虏1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轻重机枪7挺、迫击炮1门、各种子弹1万余发,以较小代价取得了较大胜利,并积累了夜间作战的初步经验。参加过此战的林维先,之后在《皖西革命回忆录》撰写的《红旗不倒(代序)》中,专门提到了花凉亭战斗,他说:“这是三年游击战中我军进行的唯一的夜间攻坚战斗,不仅取得了重创敌军一个营的胜利,也提高了各级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



位于安徽省金寨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鸟瞰图。

“铁轨上的医院”

■曹胜杰 贾昊

火车不仅是交通工具,还能在战时作为武器平台和运输车开赴战场。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有一类不承担作战任务的特种火车,运载的不是武器和士兵,而是伤员和医护人员。一列列火车在战场之间穿梭,为伤员带去生命和希望,被人们称为“铁轨上的医院”。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随着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英军尝试利用为补充战备而修建的铁路运送伤员。当时,这种做法仅限于后送伤员,还未实现在运送途中进行治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政府已嗅到战争气息,修建了伦敦地区和英国西北部的铁路。同时,他们预感大规模战争势必产生更多的伤员,便召集铁路相关人员加紧设计救护火车。1914年8月底,第一列救护火车成功问世,并前往南安普敦开始了它的使命。此后,英国一直没有停止这种火车的生产。至1918年,英国铁路公司已拥有20列专供英军使用的救护火车及31列在欧洲大陆使用的救护火车。战争期间,这些救护火车在前线和英国本土之间往返,一旦战场上有伤员被送下来,首先在前线附近的简易救护站接受基本的治疗,随后就会被抬上担架,送上救护火车,接受

更为专业的治疗。回到英国后,伤员们就会被转移至救护汽车上,送往全国各地的医院接受后续的护理。

如今,在英国约克的国家铁路博物馆中,藏有这一时期救护火车的相关照片和设计图纸等资料,从中可以了解到这些救护火车的基本情况和当时人们在车上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方方面面。这些救护火车长达500余米,有10余节车厢。其中,一半以上的车厢作为病房车厢,其余车厢供工作人员使用或储存医疗物资。当时英国医护人员数量有限,每列救护火车仅配备一至三名医生和两至三名护士。车上还安排了40余名勤务兵和几名厨师进行保障。火车上的工作并不轻松,工作人员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伤员,不仅要缓解他们身体的病痛,更要从精神上给予他们鼓励和安慰。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军利用《日内瓦公约》中不能对有医疗标识的目标进行攻击的规定,在每列火车的车顶和两侧涂上醒目的红十字标识,使敌军将其识别为医院火车而不是军用火车,从而完成伤员的平安后送。

战争结束后,大部分救护火车被重新改装成普通列车,带着那段非同寻常的历史记忆,开启新的旅程。



救护火车病房车厢内部(资料图)。

粤港秘密大营救

■汤炎忠

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的中国文化名人营救纪念馆,是岭南地区收藏中国文化名人营救史料及文物最多,也是深圳唯一的主题性纪念馆。“保卫祖国,为民族先锋”——纪念馆内,著名爱国人士郭沫若赠给曾生同志的一份题词复印件,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带领大家回到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行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攻陷香港。香港沦陷后,一大批在香港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陷入危险境地。日军不仅分区分段展开搜查搜捕,还贴出告示,限令他们前往指定地点报到,否则格杀勿论。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大都是由内地辗转疏散到香港的,难以寻求当地庇护,一旦落入日寇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1941年12月,周恩来连续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人,指示要尽一切努力,营救被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将其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区。

接到命令后,廖承志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依托东江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组织制订营救“三部曲”:首先设法与滞留在港人士取得联系,帮助他们迅速转移隐蔽;然后组织秘密护送,分批将他们撤离香港,转到东江游击区;最后再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将他们送往内地大后方。

看似简单的营救行动,实施起来却

处处险情密布,其间有日军岗卡,又时有土匪劫掠。而且,游击队当时只有300余人,财力物力有限,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全力以赴。游击队选择在日军防守薄弱地区开辟交通线,尽量避免与日军、伪军发生冲突。他们向当地绅士们筹款,以保障营救经费,还在从香港九龙至惠州白石龙百余里的交通线上,设立多处秘密接待站。

为确保安全,游击队计划派出最精干的交通员做向导,分批接送;多走山区和田间小路,尽量避免遇到日军和熟人;又派出便衣武装人员和警戒哨,一段一段地护送;再请平常与绿林道上有交往的人员出面,对沿线的维持会、土匪等做好统战工作。

1942年元旦,经过周密部署,一场规模庞大的秘密大营救拉开序幕。

首先是“先锋队”开路,廖承志等人先行出发,他们在地下交通站人员和短枪队的掩护下,秘密撤离香港,并在沿途逐一检查接待点,安排转送工作。

而后是水陆并举,同时施展营救。陆路营救方面,1月9日,茅盾、戈宝权、叶以群等人混在难民群中,从香港洛克道临时集中点出发,由交通员引领穿街越巷至铜锣湾避风塘,穿过被剪开的铁丝网缺口登上大驳船。在此前后,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等数十人也从其他集中点由交通员护送上船。

10日凌晨,交通员带领难民分别改乘3条带有草席篷的小艇,借着铜锣湾出口处巡逻日军换岗之机,疾驶渡海,



中国文化名人营救纪念馆。

安全抵达九龙市区的秘密接待点。

11日,一行人再次打扮成难民撤离九龙市区,在游击队护送下,沿西线青山道,经九龙径到荃湾,元朗的交通线,避开日军的检查岗哨,冒险通过日军封锁线,进入大帽山区;然后翻山穿谷,经元朗十八乡、落马洲,渡过深圳河,安全抵达羊台山抗日根据地。

水路撤离方面,作为重点营救对象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因年老体弱不易跋山涉水,因而安排他们乘船从水路撤离。

10日,地下党员用小船载何香凝、柳亚子及其家人前往长洲岛,拟从那里乘两艘机动帆船前往汕尾。然而,此前日军已下令没收一切机动船只的发动机。这样一来,机动帆船就变成只能依靠风力行驶的帆船了。

15日,何、柳两家人,与海丰商人一起,乘坐两艘帆船从长洲出发。岂料出海后风平浪静,被迫在海上漂流多日。在漂到新界附近的牛尾海时,船上准备的粮食和水已耗尽。正当大家焦急之际,游击队的巡逻船出现

了。他们听说何、柳等人在船上,立即向上级报告,随即送来食物和饮用水。大家这才化险为夷,最终安全到达汕尾海丰才马官港。

就这样,一批批人员分别从陆路、水路陆续撤离。

这场规模宏大的秘密大营救,历时近200天,共撤离800余名进步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驻港人员和外国友人。其间,无一人被捕,无一人牺牲,是为“胜利大营救”,并被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一壮举蜚声海内外,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各界人民和海外的影响、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秘密大营救保护了中国的“文脉”和精英,这批文化精英后续为新中国的文化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链接历史